

姚燧集



姚燧著
查洪德編輯點校



姚燧集



姚 燧 著

查洪德 編輯點校

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姚燧集/(元)姚燧著;查洪德編校.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429-6

I. ①姚… II. ①姚…②查… III. ①姚燧(1238 ~ 1313)
-文集 IV. ①Z429.4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12879 號

責任編輯:葛雲波 裝幀設計:翁 涌
責任校對:葛雲波 責任印製:張文芳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編: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字數 700 千字 開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24.375 插頁 1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ISBN 978-7-02-008429-6 定價 75.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01065233595

前言

姚燧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家。今天的讀者對他不是很瞭解了，但自元至清，人們對姚燧的品與文品都很推崇。姚燧現存《牧庵集》三十六卷，為清代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其文章給予很高評價，說：

張養浩作是集序，稱其『才驅氣駕，縱橫開闔，紀律惟意，如古勁將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柳貫作燧謚議，稱其『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扶其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雄偉光潔，家傳人誦，莫得而掩。』雖不免同時推獎之詞，然宋濂撰《元史》，稱其文『閱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為之一變。』國初黃宗羲選《明文案》，其序亦云：『唐之韓柳，宋之歐曾，金之元好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則皆異代論定。燧之文品亦可概見矣。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元代詩文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關注，進入新世紀更是如此。姚燧作為元代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家，必然進入越來越多讀者的視野。瞭解元代詩文，瞭解姚燧，可能成為更多讀者的需要。認真閱讀姚燧詩文，不僅能讓我們重新認識這位文章家，而且會促使我們重新評價元代詩文。我們以往接受的對於元代詩文的評價，多是否定性的。而這些否定性的意見，如說元代詩文不反映社會重大問題，缺乏批判精神等等，在我們閱讀了姚燧文章以後，就會感到它是沒有根據的，因而也是站不

住腳的。

像姚燧這樣的人，在他生活之當世，聲名之著，為一代之最，今天卻知之者甚少。對於這樣的文學家，一般讀者總是在具體認識他之前，先得到一個文學成就的基本評價和文學史的大致定位。

給一個作家客觀評價極其不易，文學作為藝術，其所謂高下優劣，讀者的評判，本來就具有極大的主觀性，見仁見智，難有客觀標準。我們的評價，只是盡可能努力接近公眾心目中的共識而已。公眾共識，就是所謂的客觀。姚燧在元代被推尊得極高，比之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清人顧嗣立《元詩選》姚燧小傳就說是『擬諸唐之昌黎、宋之廬陵』。元末吳善《牧庵集序》如此說：

文章有一代之宗工。……漢四百年，惟司馬遷父子、揚雄、班固四人；兩晉、魏、隋之間，則無聞矣；唐三百年，惟韓愈、柳宗元二人；宋三百年，惟歐陽修、蘇軾二人。……即我朝國初，最號多賢，而文章眾稱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

如果誠如他之所言，則姚燧當是中國文學史上屈指可數的一流文章鉅匠。這恐怕難說是客觀評價。近代文學史家錢基博對姚燧則大加貶斥，說他『以蹇澀支離之筆，抒廣末猛憤之調，而無大力控搏，無豪氣運貫』，針對《元史·姚燧傳》『春容盛大』之評，吳善序『雄深雅健』之譽，錢氏極力駁斥：『欲為『盛大』而未見『春容』。議論好為矜張而無精識，『雄』而不『深』，抑非『雄』也，膚也，廓也。辭筆特為拗強而疎脈理，『健』而不『雅』，亦非『健』也，獷也，僇也。……有意立異為學韓，不憚支離其辭，增減其字……生字拗語，怪怪奇奇……不知知言養氣為何事，而顧字句剽擬，好奇矜誕。』他如此貶斥的真正原因，並不在於文章，而在于民族感情：姚燧曾為眾多元之勛臣撰寫碑傳墓誌，這些元勛功臣在錢

基博看來，乃是殄滅漢族政權南宋的首惡元凶，「在彼之豐功偉烈，在我漢族則奇冤大憤；而譽凶人以爲元勛，奢屠戮以張德威……顧認賊作父，歌功頌德，如不容口，而不知其顛之有泚也。」^①我們可以理解民族危亡之際知識分子的民族情緒，但怒罵畢竟不是文學評價，更莫說客觀。

清代四庫館臣深明于此，在爲姚燧《牧庵集》寫的提要中，先引元人張養浩、柳貫兩人極端推尊之辭，但不作評價之依據，另引明初所修《元史》與清初黃宗羲《明文案序》之評，以之爲「異代論定」（引文已見上）。能得四庫館臣如此贊許的，決非庸劣作手。按黃宗羲的評價，姚燧之文，高居元之一代，下掩有明三百年。我們看看黃氏的具體說法：

明之文莫盛于國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禎。……某嘗標其（按：明文）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庵、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②

按他的說法，歸有光（震川）、宋濂（景濂）之文皆在姚燧之下，則有明一代，自然再沒有能與姚燧抗衡者。不過，二十世紀的古代散文選本，選宋濂、歸有光而不選姚燧。明代輯錄《中州名賢文表》的劉昌又將姚燧與宋代宋祁比較，認為文辭風格近于宋祁，而融會理道，高于宋祁，其《中州名賢文表》卷十四

①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整理本第七六四至七六五頁、七五七頁。
② 黃宗羲《南雷文定》卷一《明文案序上》。

跋云：「文公（姚燧諡文）之文……其辭類宋景文，而理之得于許文正公者（按元初大儒許衡諡文正）非景文所及也。」

清嘉慶時楊復吉編有《元文選》，其書不傳，蔣光煦《東湖叢記》卷二錄有其序，序中對元代文章有宏觀評價，說：

（元）百餘年間，魁儒碩彥，相繼挺生。匠心所運，發爲詞華，蔚然自成一代文章之體。……間嘗取而瀏覽之，或蒼茫渾灝，或淖泓演迤，或崛強可喜，或瀟灑不羣，實足嗣響唐宋，卑視有明。

此評與黃宗羲《明文案序》持論近似，清人持此論者不少。即使不說元代文章「卑視」明代，也應不低于明代。又有將元代文章與此前之唐與南宋相比者，清魏源《元史新編》卷四十七《姚燧傳》說元文祖述韓、歐而遠在南宋之上。姚燧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家之一，為元代文章定位，也就為評價姚燧在中國文章史上的地位提供了依據。姚燧在元代文章史上的位置，多數人都以為與元中期南方的虞集並稱，代表元代文章的最高成就。清人李祖陶《金元明八大家文選·牧庵文選》題辭以為姚燧文與前遺山（元好問）、後道園（虞集）鼎足而三，「以前後諸家比之，其神檢不如遺山之貴，而意蘊較深；其氣韻不如道園之超，而規模更古。」

可以這樣說：在清代不少學者看來，元代文章成就既高于此前之南宋，又勝過其後之有明。姚燧是元代代表性文章家，則其在中國文章史上的地位，可以大致論定。

借鑒以上評論，我們以冷靜的態度來比較，應該說，姚燧文高于宋祁、歸有光。宋祁之代表作如《西齋休偃記》、《雁奴後記》等，明顯不如姚燧之文，歸有光之代表作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

脊軒志》，可讀性或勝于姚文，其耐讀性則遠不及姚文。但宋濂的文章成就應不低于姚燧，特別是宋濂的一些短篇傳記，傳主都是奇人，宋濂都能寫出其風神意度，且都能發人深思。

根據以上參照，就能對姚燧文章的成就和在文學史上的位置有個大致的認識。今天的讀者對姚燧缺乏瞭解，姚燧的價值遠沒有被認識，也沒有給予他在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姚燧的價值，需要去發掘，去展示。

一 人格光芒與文章光輝

論姚燧文先要論其人。我在閱讀了與姚燧有關的文獻之後，得到這樣的認識：姚燧的人格光輝，更勝于他的文章光芒。他立身處世之折不撓，他只向高尚者致敬、不向權貴者低頭的人格精神，歷代文人，少有其比。在中國文學史上，人格高大者不乏其人，但如姚燧既人格超絕，又未遭受人身打擊者，就難找了。他能如此，與他特殊的出身、教養和人生經歷有關。

在姚燧一生中，對其人格和人生有重大影響的人有兩位，一是其伯父姚樞，一是其業師許衡。

伯父姚樞在元初具有崇高地位和極大影響，官至中書左丞，翰林學士承旨。早在窩闊台時，就曾從王子闊出伐宋，拔宋儒趙復于死俘中，攜之北歸，在北方傳播程朱理學，由此姚樞在北方文人心目中享有極高地位。後人忽必烈潛邸幕府，成為忽必烈最重要的謀臣之一。為忽必烈規劃大政、謀劃大事。『世祖奇其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元史·姚樞傳》），受到忽必烈的特別信任，並與其家族

建立了密切關係。姚樞特殊的地位和影響，為姚燧的政治生涯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豐厚的人際資源。

姚燧十八歲人大儒許衡之門。許衡是姚樞的同道和好友，姚燧又成為許衡最得意的門生。許衡也為姚燧留下了豐厚的政治資源。許衡為元朝開國大儒，元人推尊之，以為「不世出之臣」。許衡執教國子學，弟子中多蒙古親貴子弟，後多居要職。許衡的漢人和色目人弟子，也多在朝中有重要地位。姚燧與他們同門，是同門中之佼佼者，自然與他們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宋元學案》黃百家按語謂許衡「數十年彬彬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①。這些人都是姚燧的同門之友，這是多麼豐厚的人際和政治資源？姚燧本人是有明確的許門群體意識的，他誇耀其師門之盛說：「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使，棋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于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牧庵集》卷四《送姚嗣輝序》）在這一群體中，姚燧以名高一世為翹楚，當然是核心人物之一。

正是這獨特的政治背景，使他能夠不屈下于人，直言方行，無所畏懼，且能完身終老，沒有遭受前代直言之士那樣的打擊。

應該說，在專制時代的中國，作為一個文人，不說違心話又能自保，是極為罕見的。在強權面前，要麼依附權勢而自毀人格，要麼堅持人格而招致人身迫害。既保全人格又保全人身，幾乎是不可能的。正是對中國文人的兩難處境有著深刻的認識，深諳中國歷史的許衡當年就堅決反對姚燧寫作文章。他曾告誡姚燧，說以文章名世，「非周身斯世之道也」（《牧庵集》卷四《送暢純甫序》）。所謂「周身」，

① 黃宗羲等《宋元學案》卷九十一《靜修學案》，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點校本。

即保全自身。前代文人總要在保全人格和保全人身之間做出痛苦而無奈的選擇。保全人格，多一生坎坷，甚至有性命之虞；放棄人格，又取『文人無行』之千古罵名。清人顧炎武對許衡之論很是認同，並加以發揮，以漢馬融、晉徐廣、宋陸游的人生遭際加以論證^①。姚燧的難能可貴處在於，絕不做違心文字，在權勢面前，志不為屈，氣不為撓，以此博得一代文人的尊敬與讚揚。秉筆直書，不隱惡，不溢美，有良史之風，贏得一代人的信任。《元史》本傳云：

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為愧恥。故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勳、顯行盛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

當然，他也有不得已而作的文章，比如奉皇帝、后妃、太子、諸王之命而作。但在這些文章中，他決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當揚當抑，一斷之以是非之公，決不曲筆以媚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景下，姚燧都不作曲論以迎合他人。

在中國文章史上，姚燧文氣之盛，難有其比。時人劉將孫對此深有所感，《與姚牧庵參政書》具體分析了姚燧文氣之所以昌的原因，集中表述為『文章門第，為天下第一，以真儒位參預』，因而能夠不『怵于勢利而失其所從』，作為文章，『不憚不疑，不膠不撓』。姚燧文章，確實如此。當說當言，無所避忌。在《董文忠神道碑》中，以至於寫了『聖主』忽必烈的荒唐之處。在《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中，直指雄踞山東的漢族世侯嚴忠濟為『強橫難制』（均《牧庵集》卷十五），在《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①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文非其人》，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集釋本。

中有對中書左丞相、同知樞密院事、元軍渡江作戰總帥伯顏的指名批評（《牧庵集》卷二十八）。筆鋒所指，從無畏懼。這類橫筆直書的文字，我們讀了感到吃驚，在姚燧文章中卻時時而有，不為鮮見。

姚燧不做人情文章。古人很多文章，是受人請託而作。主人請名家作一篇記、序，是為了風光。一般文章作者都深明此道，不過說說好話，作個人情，博主人高興，大家歡喜而已。但姚燧卻不入此道，有人請他寫文章，他卻在文章中把人家批一通，結果自然是大掃其興。其《王憲副母夫人九十詩後序》一文，是受王憲副請託而作，王憲副母親九十壽辰，請一幫詩人寫了些讚頌、祝福的詩，請姚燧寫一篇序，為了更增光彩。沒想到姚燧看了這些人的詩，不僅沒說好話，還說這些詩寫得荒唐，大悖于理：

然反披而覆誦之，猶病其言有矛盾者：既稱夫人婦王婉順矣，當節度君（夫人丈夫，王憲副之父）守趙，將以城活斯民，而夫人一言制之，是越壺內而出于戎律也。顧以節度君之雄烈識度，其揆義委質，取必夫人之一言，是舉閭外而入稟牆帷也。兩戾其道，恐君、夫人之賢，兩不為是。筆斯言者，將以是而信來世，非誣人耶？且今之巧于術智者，人猶莫忖其心之何在，況蒼蒼之高天幽邈，卑人以年，而曰：『吾得之，必由是事而致。』非誣天耶！（《牧庵集》卷三）

把那些拍馬屁的人罵了一通。其意大約有二：一是有人為頌揚夫人，說當年其丈夫有關一城守與降之關鍵決斷，乃決于夫人之一言。姚燧認為，果真如此，那是女人干預外事，非夫人之德，反有悖婦德。丈夫聽命于婦人，也有損大丈夫之『雄烈識度』。二是大約有人說夫人九十高壽，乃上天報夫人之德。姚燧說，天意幽邈難知，這話是瞎說。下文又說：『詩中或有贊夫人能誦浮屠書者』，意在說明夫人之善良。姚燧素不喜佛，竟然從剖析信佛者的心理入手，說信佛者要麼愚蠢，要麼貪婪。這篇序十足表

現了姚燧的人品和文品，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說『余之斯言，雖足取愠一世，而世之人以為知言者多矣』。如此寫作，雖未必『取愠一世』，但取愠主人一家是必然的。這樣的文章家，在中國文章史上極其少見。姚燧的可貴處正在於，他從來不迎合他人，永遠要真實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姚燧這類文章還有不少，如《牧庵集》卷五《崇陽學記》，作學記而罵學官，揭發學官之奸詐貪墨，種種醜行，反映當時現實，極具批判力量。姚燧也明白，如此作文會開罪于人，『或曰：「人之言曰：『髮有疾，幘則冒之；』手有疾，袂則蔽之。』子而記學，不諄諄乎教養之道，而惟歷發職學之惡，非長者也。』曰：上之膏澤斯土也如何，而不善其職者屯之，事有急此乎？』（《牧庵集》卷五）他認為，揭露這些弊端引起關注並加以治理，比『諄諄乎教養之道』更為迫切。至於學官們是不是高興，在他已是置之度外了。

姚燧是個說實話而不求合于時宜的人。其不合時宜不止于以上所舉，不討王憲副一家喜歡，開罪當時的一些學官，是小不合時宜，排佛纔是大不合時宜。在元代，佛教據有特殊地位。宋儒以佛老為異端，周張二程，都致力於批佛老，以為異端不息，聖學不明。但到元代，由於朝廷對佛教的特殊保護，元代文人，包括理學家，幾乎無人排佛。不知時宜依然高張排佛旗幟的，只有姚燧這樣的人了。他屢開罪于佛徒：奉太子命作《儲宮賜龍興寺永業田記》，他竟在記文中聲明自己是『以壓于儲皇之命，不敢禮辭』（《牧庵集》卷九）。在《重建南泉山大慈化禪寺碑》中，更是引韓愈的話表達自己的強烈不滿：『余儒者也……韓子嘗曰：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牧庵集》卷十）屢屢如此，終於招來不小的麻煩。據劉時中編姚燧《年譜》記載，武宗至大四年（一三一二），姚燧奉皇帝之命撰《南寺碑》（按當即《崇恩福元寺碑》，載《牧庵集》卷十）。寺僧在姚燧所作碑文中極力吹

求，羅織罪名，攻擊姚燧，以至于皇后召集有關人廷辯。姚燧因文字而遭致的誹謗和攻擊應該不少，只是少見于文獻記載，張養浩祭文譏諷一些人『面譽其削鐻，背非其覆瓿』，柳貫所作《姚燧諡文》也作憤憤之言：『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頌已十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都傳達了這方面的信息。

姚燧以難以『周身斯世』的文章為業，雖屢遭誹謗，但始終沒有受到大的打擊，得以全身以終，人格、人身兩全，這歷代文人難以達到的境界，姚燧達到了。家教和師教，養成了他直道而行的高尚人格，家門與師門又留給他特殊的政治資源、人脈關繫，成為他護身的法寶，也給了他特殊的、同時代甚至歷代文章家少有其比的氣節和膽量。他不僅以文章，更以人格為世景仰。元代文人，不管南方北方，不管為文主張是否與之相合，都對他表示極大敬意。如『元詩四大家』之一的楊載有《壽姚承旨》詩云：『皇猷資黼黻，大筆主文章。』碩望高天下，榮光近日傍。』舊族名先著，高門慶甚長。』此在生前。在其死後，元末文人危素《姚文公廬山牧庵》詩說：『昔公參行省，于此駐旌旄。至今讀書堂，名配匡廬高。』^①張養浩對姚燧的人格光輝特加推崇，以為有如此人格纔有如此文章：

其尤可偉者，不權之阿，弗勢而移。遇有論著，屹無詭隨。或竹帛之揭，或金石之垂。褒其賢，則賤者尊而死者昭于後；誅其佞，則榮者辱而生者冥于時。古所謂良董遷者復奚忍？而觀夫靈明之境，湛乎其不波；含宏之度，廓乎其無籬。隆于風節，粹于倫彝。芥功名而無意于屑

① 楊載《楊仲弘集》卷四，《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危素《危學士全集》卷十四，清乾隆刻本。

屑，塵富貴而惟道之怡。^①

『不權之阿，弗勢而移。遇有論著，屹無詭隨。』道出了姚燧為人、為文之真精神與不可及之處。姚燧有散曲〔中呂〕《陽春曲》云：『金魚玉帶羅袍就，皂蓋朱幡賽五侯。山河判斷筆尖頭，得志秋，分破帝王憂。』筆頭風月時時過，眼底兒曹漸漸多。有人問我事如何，人海闊，無日不風波。』在對姚燧有了上述瞭解後，再讀此曲，當有更直觀、更客觀的理解。

我們仰慕姚燧的文章氣節，仰慕他所達到的人格、人身兩全的境界。人格的光輝，增強了他文章的光芒。由此我們纔能深刻認識姚燧在中國文學史上獨特的價值。

二 以信史之筆展示宋元之際歷史圖卷

姚燧文章的價值和成就，首先體現為，他以信史之筆為後世展示了宋元之際宏闊而真實的歷史圖卷。

宋元之際以及整個元代的歷史，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都是最惹動中國文人情緒的。在二十世紀寫作的宋元史和宋元文學史中，大部分是宋人視角。由于元代文獻遠不及宋人文獻完備，即使讀古代文獻，也多宋人視角而少元人視角，客觀反映那個時代的文獻不多。姚燧是元代文章家，其文集中有

① 張養浩《歸田類稿》卷七《祭姚牧庵先生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大量宋元之際重要歷史人物的碑銘墓誌。姚燧所寫，自然是元人視角。但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僅有客觀寫實的膽量，而且有信史傳世的明確意識。在《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並序》中，他說：

燧由職史館以來，嘗思古者史臣，不要死者之或知，不必生者之見求。于德于功，于事于言，

見書見而聞書聞，信傳信而疑傳疑。實錄直致，俾觀者自判是非于千載下。①

具有如此明確的意識十分可貴，踐行這種理論更是難能。難能可貴，姚燧都做到了。姚燧文章，由此能夠成為那個時代很具客觀性的文獻。比如說，在《牧庵集》卷二十一《少中大夫靜江路總管王公神道碑》中，姚燧很形象很生動地描寫了宋亡後靜江宋將婁鈐轄率領二百五十人拒不投降、集體殉難的壯烈，至今讀之，仍震撼人心，為他們的大節大義而感動，而起敬。《宋史·忠義傳》等文獻，顯然都是依據該文記載而轉述，生動形象則不及原文。他還多次寫到蒙古軍在滅宋戰爭中屠城之殘忍恐怖。還有《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揭露元朝官員為政之酷，刑罰之濫，「榜掠百至，或關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疾死者已數百人。」以及逼民為盜，都讓人觸目驚心。《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中記姚樞向忽必烈談元軍早期在河南、四川的軍事行動，批評說「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後來的渡江作戰，雖有忽必烈不殺之嚴令，但軍官們並不執行：

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伯顏濟江，兵不逾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逾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

① 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二，明正統道藏本。《牧庵集》失收。

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丘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牧庵集》卷十五）

『四壁之外，縣邑丘虛，曠土無民』，十二字寫照，纔是元滅宋戰爭的真實。我們再讀其《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大司農史公神道碑》，其間寫到墓主史耀在浙江平叛的一段經歷說：『從浙省臣破賊柳分司眾七千括蒼，又破呂成、婁蒙才眾十萬，斬其尤猖獗建黃屋、署官至平章者楊鎮龍及屬制置，皆于東陽玉山，摧兪高五百餘人紹興，又斬詹老鷄、林雄、劉甲一、潘正，皆有眾萬餘自王于溫、處間者。』（《牧庵集》卷十六）這似乎極簡單的幾句話，涉及的是十三萬多人的命運。這十三萬多人，按照當時的情況，或被殺，或被擄為奴，一般是包括妻女全家為奴。這絕不是主觀揣度，姚燧在另一篇文章中為我們提供了依據，其《轉運鹽使曹公神道碑》說：『凡民為群盜鍾明亮劫脅污染，進討將士取而奴者，無慮千人，皆汰之』（《牧庵集》卷二十四）。連與反叛者有關係的老百姓，軍人們都『取而為奴』，反叛之眾及其妻兒子女，除被殺與為奴外，還有其他出路嗎？特別有趣的是，姚燧常常在表彰一人時，揭露整個時代、整個官場的黑暗與混亂。『今中書省右丞相伯顏……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有不荒貪，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牧庵集》卷二十八《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他道為使，惟知徼寵專利，賊下罔上以自私，盈路怨咨，莫之省恤。獨公軫歲旱荒，發庾下估，市粟以濟其饑』（《牧庵集》卷二十三《有元故少中大夫淮安路總管兼府尹兼管內勸農事高公神道碑》）。上例罵倒了幾乎全部渡江作戰的元軍軍官，後一例則揭露出元代政治的一片黑暗，罵倒了幾乎全部的地方官吏。

從蒙古滅金前後到元滅宋統一全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很特別的時期。不管是滅金前後的北方，還是滅宋前後的南方，中國歷史都呈現出異常複雜的局面，各種矛盾都充分暴露出來，形勢又往往瞬

息變化，舊的社會秩序被打亂而新的秩序未能建立，形形色色的人物在社會上進行著各種表演。這種紛亂，姚燧以他的信史之筆客觀真實並深刻地揭示出來。比如他多次寫到河北史氏與武仙的爭奪，幾次反復，且有藁城董氏的介入。其中所表現的歷史的複雜程度，絕對不是後世史學家那種或帶民族情感或作道德評判的思維所能解釋的。歷史學家發明的種種理論，可能引導我們從紛繁的歷史事件中理出頭緒，認識本質或發現規律，但也可能將我們導入陷阱，誘導我們以先驗的理論眼光去看待歷史。被理論過濾了的歷史，失去了複雜性，也失去了豐富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真實性。姚燧文章對當時歷史相對較為客觀的呈現，倒能使我們放下各種理論眼光，以一種雖樸素但更能接近真實的眼光去審視這一時期的歷史。在這樣的特殊時期，很多矛盾的走向，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很多人物的命運，也極具戲劇性。《牧庵集》卷二十八《河東檢察李公墓誌銘》，就表現了在山西榆次、太原等地的戰亂中，墓主李懋時命運偶然性和戲劇性的變化。原本一介小民的李懋時，被推到了歷史的前臺。而榆次一城的戰與降，其決定的作出，好像並不取決於所謂的大節大義，也不取決於保全生靈的仁人之心。進一步還揭示出，時局如此，歷史的真實是『人自為謀』，大節大義不僅不是眾生們作出選擇的根據，還可能是陰謀家得以呈志的招牌。姚燧的敘述，可能很讓歷史學家們失望，但真實的歷史往往就是如此。

但另一方面，姚燧則通過一些具體人物遭際的敘寫，讓讀者感受到歷史發展的大勢。宋亡之前，上下睽離，同列猜忌，已成分崩離析之勢。有才者不為所容，有志者報國無門，有人被逼走投無路，只好投敵。這樣一個政權，在元軍的進攻面前土崩瓦解，是必然的。姚燧《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所記趙